

文章编号:2095-0365(2013)03-0030-04

杜甫栖居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

王艳军, 宋俊丽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摘 要: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和经济上的困顿,杜甫栖居成都草堂。草堂使杜甫从空间上避开了战乱,安逸宁静的草堂生活可从精神上弥补先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真心归隐,杜甫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儒家思想的影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的两重性带给他情感归属的困难。草堂期间杜甫虽然表现出了怡然自得、尽享天伦的情趣,但他的心灵深处是复杂的,杜甫不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他在精神上始终挣扎在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痛苦之中。草堂不是杜甫的“桃花源”,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杜甫;草堂;精神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在“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1]485}的草堂时期,杜甫暂时享受到了独在烟尘之外的安逸宁静的生活。草堂时期虽然短暂,却是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就杜诗而言,草堂时期杜诗的题材、内容、体例、风格等较入蜀之前有较大的变化,特色迥异。其中草堂时期杜甫所流露出的隐逸思想及其起因、表现、影响等尤受后世学者关注,著述繁复而又论说纷纭。争议的根源在于杜甫此期生活、思想、心态的变化。草堂远离战乱的中原,杜甫远非像诗中所描写的“薄劣惭真隐,幽偏得自怡”(《独酌》)以及“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漫成》其一)那样真正的闲适自得,杜甫始终处于精神困境之中。

一、杜甫栖居草堂的原因

要深切体察杜甫成都草堂时期的精神困境,可先从他定居草堂的原因和目的来考察。

(一)杜甫定居草堂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困顿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家庭,“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直是其人生的理想。步入中年尤其是困守长安的十年,杜甫更多地体验到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寄人篱下的屈辱,使杜甫孕育了“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的悲愤,也使其经历了“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以及“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人生大难。安史乱发,《羌村》、《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写出了政治的多难和民生的多艰。华州辞官,乾元二年7月杜甫携家往依秦州,10月转奔同谷,在同谷杜甫陷入了“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寓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的生活困境之中,《旧唐书·杜甫传》则记载了杜甫此时的生活状况:“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椽,儿女饿殍者数人”^{[2]5054}。虽有些夸张,杜甫生活困顿艰难却是事实。为生活

收稿日期:2013-04-22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2WX028);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201303317)

作者简介:王艳军(1971-),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所迫,杜甫“不畏道途远”(《泥功山》)“无食问乐土”(《发秦州》),12月又远赴成都,《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7首、《秦中杂诗》20首等一系列诗歌,描述了杜甫“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悲痛。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终于到达了成都府,并在第二年即上元元年(760)暮春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修筑草堂,使“饥饿穷山,流离道路”的生活终于告一段落,开始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草堂生活。总之,战乱的年代、个人生活的穷困是杜甫定居草堂的主因。

(二)杜甫定居草堂并非归隐

成都的富庶繁华,浣花溪水的美丽清幽,生活的衣食无忧,使诗人暂时享受到了难得的安逸和宁静,《旧唐书·杜甫传》中也记载了杜甫定居草堂后的状况,“甫于成都浣花溪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2]5054},生活环境、思想情怀的变化使得杜甫表现这种生活和情趣的诗篇与以往不同,诗作中展现的乐趣和自得,所描绘的生活情境,所流露的潇洒情趣,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格,在充满忧患苦难的杜甫诗史中显得那样独具特色,冯至先生将杜甫这种变化看作是“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3]216},但这种变化并非像胡适所说的“杜甫过的真是田园生活,他的诗真是欣赏自然的诗”^{[4]276}。杜甫在《江村》、《堂成》等诗中表现出的怡然自足之感和陶渊明那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陶渊明《归园田居》)的闲适心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春归》一诗,《杜臆》曰:“‘苍径’、‘茅檐’起句,是追忆草堂花竹之盛,别来三年,甲子频换,今始得归,到日忽值春华,旧时花竹,存者必复生发,江边故石浅沙,依然如故,倚杖而看,倾壶而就,如见故人,即远鸥、轻燕,各遂其性,与人意合,而喜可知已。因叹世路多梗,吾生有涯,莫思身外事,且饮生前酒,醉醒辗转,有兴可乘,即此为家而已,非不思故乡,而奔走已倦,暂得息肩,亦足乐也”^{[5]189}。同样的情景、同样的写法也呈现在《野老》等诗中,在春江晚景与漂泊旅情的对照中,诗人杜甫“几于泪痕湿纸矣”^{[1]617}。

总之,草堂乃是杜甫久经流浪后的暂时安逸之所,杜甫栖居草堂乃是客观情势所迫,并不是想真心归隐,杜甫是以矛盾的心态对待草堂生活的。在经历了无数的苦难、艰辛、流离之后,杜甫眼中

的草堂生活过于理想化了,草堂只不过是杜甫苦难心灵中的一丝慰藉,唯其如此,杜甫栖居草堂后的精神苦恼才是无法排解的,“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两首》),这才是杜甫心中无法排遣的真正苦痛。

二、杜甫草堂时期的矛盾心态

定居草堂,杜甫并没有完全忘却尘世,此期杜甫既有身处安逸生活的自得,也有关注时事反思自身的愤懑,“睹景则销愁,思家则生愁”的矛盾心态,情感归属上的困难,使杜甫陷入了精神困境之中。

(一)闲适惬意、悠然自得的草堂生活的展现

定居草堂生活得以片刻安宁,有友人的施舍和供给,杜甫也前所未有的体会到了生活的平静、安逸和欢乐,甚至流露出了知足常乐的情趣。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田舍》);“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等。同时杜甫在与南邻北舍相邀交往中获得了无尽的欢乐:“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酣饮之极,以至于“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南邻》),这些都展现了轻舟泛水、邻里娱乐的朴实的江村生活。

在这种生活情趣中,杜甫以平和、自适的心态描写着江村景物之可亲可爱和质朴自然。如“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江涨》);“仰蜂沾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鸂鶒西日照,晒翅满鱼梁”(《田舍》),以轻松的笔触,描绘出了江涨柴门、迎风雨燕、逐浪鸥鸟、鸂鶒晒翅、杨柳绿枝、枇杷幽香等江村景色。在这样的“诗中有画”的境界中,那花鸟春风、杨柳禽鱼,都体现出诗人杜甫愉快、平和、自适的心境。这一幅幅美丽的江村风景图画,表现了杜甫在草堂生活中的闲暇、欢乐,这是饱经忧患沧桑的苦难诗人的心灵和情感的一次释放。

(二)叹世思乡、忧时嗟身的凄凉情感

的展现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这种生活表现了诗人杜甫在离乱之后暂得安宁的怡然自得的心态,也流露出些许自足的意味。但作为一个“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诗人,他的精神情感却绝不可能只满足于此。

杜甫虽然离开了战乱的中原,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却仍然关注着战乱的社会和动荡的朝廷。虽写出了美丽的风景和自得的情趣,但诗人杜甫的心态不可能完全消融在自然之中,内心深处忧国爱民的情节是难以消除的。就这一点来说,杜甫的精神倾向和他的现实生活状态发生了错位。造成这种错位的主要原因是“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情感取向背离了社会为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经历战乱流离之后,面对真淳朴素的生活环境,杜甫尽量地贴近自然,贴近真淳安逸的生活状态,但这些并非杜甫主动追求,他的一切情感和行动都烙上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理想的痕迹。对理想的坚守和对政治的关注,使杜甫虽然欣赏和自足于所面临的生活状态,却不能完全融入到当下所处的生活之中,这就是杜甫痛苦的同时,更使他因远离中原和朝廷而愤懑孤独。

杜甫虽然在一些诗作中展现了江村生活的安逸和思想情趣的闲适,但这种生活更加反衬出了杜甫流落他乡的境地和久客思归的心情。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肠断江城雁,高高向北飞”(《归雁》),那北飞的大雁也更加出发了“万里客”的诗人期盼乱定归家的情怀。“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地卑荒野大,天远暮江迟”(《出郭》),想到战乱未平自己客居他乡、兄妹分散,自己又老病孤贫,相见遥遥无期,自己就“拭泪沾襟血,梳头满面丝”(《遣兴》)。“寂寄春江晚,欣欣物自私,江东犹苦战,回首一蹙眉”(《江亭》),在这首诗中,诗人以万物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衬诗人流离失所的境遇,以春光的晚景反衬诗人岁月流逝人生迟暮之感。用江东概指中原故乡,以中原的战乱反衬诗人流落

他乡的苦痛。“恋阙丹心破,沾衣皓首啼”(《散愁二首》)以及“江城今夜客,还与旧鸟啼”(《出郭》)等诗作中的悲凉、伤感,才是草堂时期杜甫这位客居他乡的老人心态的真实写照。

三、杜甫复归草堂后的困惑

杜甫栖居草堂无法忘怀政治。一方面杜甫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真心归隐,陶渊明任情适性的快乐并不是杜甫的精神追求。另一方面,“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理想和“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精神情感也使杜甫无法“独善其身”,儒家的理想和道义影响着杜甫的现实生活和情感倾向。杜甫在草堂期间曾入严武幕后又辞归草堂,代宗宝应元年七月后因避成都徐知道叛乱而在梓州、阆州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又复归草堂,这两段生活经历使杜甫参与了政治,结交了政治中的各色官员。《九日》、《早秋苦热难答相仍》、《遣闷呈严公》、《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立秋雨院中有作》、《初冬》诸诗,表达了幕府公务繁重(陪客、迎送等)、沉沦下僚的境遇与杜甫的政治愿望相悖的烦闷情绪。《春归戏题恼郝使君兄》、《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等诗,表达了杜甫对那些只顾自己寻欢作乐、醉生梦死官员的愤怨和对国事的忧虑。复归草堂的身心愉悦之感再次释放出来:“苍苔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归到忽春华”(《春归》),“入门四松在,步展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来,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需”(《草堂》),草堂的自然风光、邻里风情依然是那样美好,使得杜甫心情舒畅,创作了《到村》、《绝句》、《营屋》、《长吟》等诗,叙写了回归草堂的喜悦。

然而喜悦只是暂时的。陶渊明于政治现实失意之后,创造了自己心中的一片乐土——桃花源。成都草堂并不是杜甫的“桃花源”。由展现草堂的安逸宁静到对政治、朝廷的忧心关注,还不足以满足杜甫的情感需求。“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矛盾痛苦的心态使得杜甫对长安、对中原、对故乡的忧思愈加深重。“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哭大江。……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炙天边行》)。这位时时自称“江边老人”(《释闷》)、“天边老人”(《天边行》)“思

归客”(《江汉》)、“万里客”(《归雁》)的诗人,最终离开了成都草堂,走上了“每依北斗望京华”(《秋兴八首》其二)的回归中原的漂泊征程。

尽管中原战乱并未平息,政治并未清明,但心系朝廷毕竟是杜甫一生的情感支柱。从这个角度

看,辞幕重归草堂只是加重了杜甫情感上的困惑,草堂只是给杜甫提供了一个暂时的心灵栖息地,并不能真正消解“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的矛盾心态带给他的精神困境。

参考文献：

[1]浦起龙. 读杜心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61.

[2]刘昉.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冯至. 杜甫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

[4]胡适. 白话文学史[A]. 胡适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王嗣奭. 杜臆[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On the Spiritual Dilemma of Du Fu During the
Period of Living at the Thatched Cottage

WANG Yan-jun, SONG Jun-li

(Humanities Colleg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After suffering the political frustration and life of privation, Du Fu made a choice to move on and lived at Chengdu cottage. The Thatched Cottage provided not only a space for Du Fu to escape from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but also an ease and peaceful life for him to compensate for regrets in the reality. For Du Fu, dwelling at Thatched Cottage was forced by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but he didn't really want to live at the hermitage, which was why Du Fu held a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wards the Thatched Cottage lif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a drifting life and dual personality made him difficult to position his emotion attribution. It is seems that he was happy and pleased with himself and enjoy the family happiness, but Du Fu couldn't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nature with the mixed feeling and struggled with the pain of caring for the fate of his nation, experiencing homesickness and being dissatisfied with himself. The Thatched Cottage is not the Peach-Blossom Source for Du Fu, but just a temporary agreeable garden for thinking, therefore, Du Fu's spiritual dilemma was resourced from the contradictory mentality-melancholy caused by homesick and dispelled by being full of emotion when facing the scene-was not ultimately resolved when he lived at Thatched Cottage.

Key words:Du Fu; thatched cottage; spiritual dilemma